

“外挂”泛滥，数据真实性存疑，内容审核存盲区

“野蛮生长”的直播答题将走向何方？

甚至将其称为“年轻人的广场舞”。

这些答题节目的规则基本相同，一天有几场节目，由直播主持人出题，每道题目有相应的时间限制，超时或答错将被淘汰，答对全部12道题者瓜分当期奖金。很多答题节目还设置了“复活卡”，回答错误时，可使用“复活卡”复活一次。“复活卡”可通过拉来新用户获得。

1月15日20时，“百万英雄”答题活动开出了500万元奖金，吸引了将近500万人参与答题，最终40余万人通关，每人分得约12元。

当日，其他直播答题活动在同一时段也吸引了上百万网友参与。近千名网友同时参加，掀起了直播答题活动的高潮。截至2月初，多家平台累计奖金数额已超亿元。

为获得奖金，“答题小组”开始出现。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宠说，她们的答题小组由几个同学组成。大家平时相距较远，一般在答题时会采用群语音的方式，共同分享答案。目前，她们已多次获得了奖金。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QQ中搜索“冲顶大会”，发现至少有数十个2000人的活跃群。

记者付费加入了其中几个群，发现这些群是“答题小组”的扩大版。每次答题时，群内部分成员会集体参与。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秋菊表示，电视综艺节目早期播出时答题类活动就曾吸引大量关注，而现在把“快速抢答”搬到移动端，一方面进一步降低了门槛，同时也通过“好友分享、组队参赛”等方式增强了竞赛的互动性。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直播答题栏目的火爆。

有业内人士称，尽管看上去是平台在“撒钱”，但通过直播答题获取用户的成本目前仍较低廉。

例如奖金设置为100万元，有50万人参与，那每个用户的成本就是2元。这是为平台获取新用户和增加用户活跃度的“捷径”，对广告商也很有吸引力。

腾讯云知识竞技解决方案技术总监黄斌表示，作为“冲顶大会”背后的技术服务商，直播答题火了之后，公司的业务也随之繁忙起来。

目前，已有十几家公司表示想接入“直播答题”功能，包括在线教育类、聚合新闻类、电商直播类、游戏直播类等。

在直播答题走红的同时，搜索神器和“外挂”

软件也搭上了“顺风车”。

百度的“简单搜索”使用了智能语音识别技术，用户按住说话后，几秒钟内APP会给出搜索结果。之后，搜狗推出了“汪仔答题助手”，360公司推出了“超级智能答题神器”等。

另外，由于“复活卡”可帮玩家在一场游戏里多增加一次答题机会，不少电商平台上出现了兜售“复活卡”的店铺。“复活卡”单价1元左右，部分店家已销售数万笔。

一定程度“美化”在线人数、奖金额

资本进入后，答题内容开始出现意识形态渗透和广告化的倾向。新鲜感也在减退，有用户参与游戏的频率，由每天参加变成了2至3天试一次

有奖竞猜类APP引来了众多关注，不少广告商看准这一人气平台开始投资布局，为答题类游戏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不过，到了2月份，部分答题的“铁粉”开始出现松动。在河北医科大学行政岗工作的王学嘉说，尽管目前已放寒假，但他参与游戏的频率由每天参加变成了2至3天试一次。“从开始参与到现在，累计获奖也就100多元，每场消耗的时间也比较长，最开始的新鲜感已经过去了。”

与此同时，很多网民开始吐槽直播答题参与和答对的人数方面的真实性。

比如“在线人数122万，参与答题的有140多万？”“答到最后，眼看着通关后可以分40多块，结果最后一把有3万多人复活，奖金一下子降到了11块，这个预算控制我服了”……

针对参与人数大于在线人数的问题，花椒直播相关负责人表示，答题游戏的参与用户不仅来自花椒APP，还包括PC端、快视频及浏览器等第三方平台。由于技术原因，目前在线人数只显示APP上的，其他平台的答题用户数未及时体现，会尽快进行优化。

但也有业内人士称，奖金总额、参与人数等数据，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美化”，这样可在总投入不大的情况下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此前，各答题平台一般规定，用户分得的奖金

超过10元即可提现。但现在《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发现，部分竞猜类平台已把提现门槛提高到20元，还要授权个人信用信息等。这一调整，增大了用户“退出”难度。

在“头脑王者”被封前，花椒直播的“百万赢家”活动在一场“直播答题”中，将香港、台湾与加拿大并列“国家”选项，严重违法违规。14日，该平台负责人被北京市网信办约谈，要求花椒直播立即进行整改，及时回应社会关注。

而资本进入后，答题内容开始出现意识形态渗透和广告化的倾向。例如，某直播平台的一道题目：为什么某企业会把研发基地选在美国？答案是科技人才更多元。这就将价值观潜移默化地传播给了答题者。

某平台还有一道题：某品牌外卖送到时为什么还是热的？答案是“该外卖品牌用了特殊的保温材料”。这让本以传播知识为基础的答题变成了消耗人们时间去看广告的活动。

有受访用户表示，这种零敲碎打的知识点，对个人知识体系建设并无太大帮助。且目前奖金不高，很多时候是“一元专场”，钱还不够“塞牙缝”。另有用户表示，参与答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与朋友一起热闹热闹，如果是“广告专场”，他们的用户体验会下降；若发现平台数次“造假”，他们可能会选择放弃。

此外，奖金如何纳税也成了盲点。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教授陈佳称，答题奖金属于偶然所得，没有起征点，应该缴纳20%的税款，如一场总奖金500万元的活动共应缴纳税款100万元。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就纳税问题采访部分答题平台时，对方均称他们不代扣税款。目前，获奖者都需自行申报个税，而不少用户对此并不知情，称并未有过缴税行为。

如何防止“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专家认为，相关部门应对答题平台建立信用积分制，出现答案错误、内容低俗化倾向、内容诱导等情况就扣除相应分数

“竞技答题 撒钱”经过一个月持续的高频度竞争，新用户的开发成本会逐步提升。”王秋菊说，“目前直播答题已趋于‘下半场’，如何保证用户留存是关键。直播平台应投入更多创意，把握题目难易程度、丰富题目内容和形式，不断刺激人们的答题欲望。”

同时，为防止“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王秋菊认为相关部门应对答题平台建立信用积分制，对原则性错误“一票否决”。

出现答案错误、内容低俗化倾向、内容诱导等情况就扣除相应分数，一旦积分到达“红线”之下就需对答题平台进行整改，若出现原则性错误，要对平台进行“一票否决”。而对表现较好的平台，也应给予某种程度的奖励。

对于题目的设置，“资深”用户王学嘉称，可多些红色文化及正能量的传播。“毕竟答题的本质是一种信息传播，信息中会包含文化的传播、价值观的传播等，各平台应坚守社会责任，在新时代让互联网健康持续发展。”

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他们对其他平台“注水”多少并不知情，希望能有第三方对所有答题平台的真实数据进行监控，让人们在良性的竞争下发展。一旦监测出某些平台的虚假宣传，相关部门应增大其“违法成本”，处以重罚，借助监管增加政府在网民中的信任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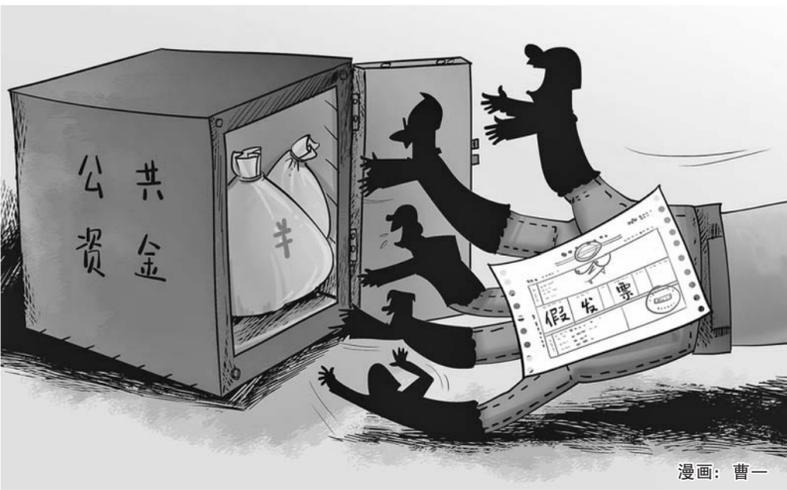
陈佳指出，目前，有奖竞猜类奖金如果平分，用户多分得20元以下，保证完全单独报税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对此类社会热点进行回应，对如何纳税做出解读。

同时，针对部分用户反映的奖金提现困难等问题，专家表示看似单个用户可能只有10多元的余额，但用户体量加起来也是巨大的资金流，平台一旦撒出，这部分钱用户能否顺利拿到就成了疑问。

因此，要对答题平台的资金池进行监管，可参考对P2P市场的监管模式，将答题平台资金池正式纳入金融监管，规定必要的信息披露，设置准备金的备余等资金管理红线。

副县长用“假发票”套现 345 万元的背后

虚开、倒卖发票的“发票腐败”，在一些基层地方仍是一条“黑色利益链”



漫画：曹一

的要求。

司机文明华经常在他耳边提起，一些领导干部存在大吃大喝、用虚假发票报账的情况，并建议他也“想想办法”。

这让刘红安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执纪部门查明，2011年3月，刘红安得知自己即将从东安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岗位调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职务，便主动找时任东安县检察院检察长胡某，说自己在政法委有些开支尚未报账。胡某心领神会，爽快答应。事后，刘红安让文明华用虚假发票到东安县检察院报账5.56万元，并安排文明华将这笔报账款存入他人的账户保管。

一旦伸手，贪欲就无法控制。2011年3月以后，刘红安利用到长沙等地出差的机会，安排文明华多次购买、虚开餐费、烟酒等虚假发票。

调任双牌县常务副县长以后，刘红安依然不知收敛。2016年1月，刘红安对双牌县政府办主任陈某说自己要去走访跑项目，需要到财务室借款8万元。陈某答应后，刘红安安排文明华到县府办以出差名义借出了这笔钱。8月初，双牌县政府用电脑耗材等发票冲销了这8万元“借款”。

执纪部门调查发现，截至“落马”前，刘红安伙同文明华通过购买“假发票”和虚开发票，先后从10多家单位套现超过345万元。

刘红安案并不是孤例。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湖南、广西、福建、江苏等省区调查发现，在中央禁令之下，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少数党员干部仍然存在大量违规公款开支等情况。部分基层干部表示，“假发票”乱象背后隐藏着触目惊心的“真腐败”。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所谓的“假发票”，从票据

本身来说基本上都是正规发票，但这些发票都不能反映真实交易情况，有的是为了掩盖按规定不能报销的“灰色开支”，有的干脆没有实际交易，纯粹为了套取公共资金。

“年底报账多，发票早就卖完了”

只要发生使用公款的“灰色开支”，肯定就有“假发票”。“假发票”已成掩盖“灰色开支”的“隐身术”

根据小陈提供的电话号码，《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给被人称为“杨老板”的“票贩子”打电话，向对方提出想购买三四万元办公用品发票。“杨老板”对记者说，“长沙的发票，开办公用品，现在恐怕搞不到。年底各单位报账多，发票都卖完了。广州的行吗？油票可以？长沙的油票现在还能搞到。你如果不急，下个月再找我咯。”

“公司有些开支，比如领导请客、送礼，按照规定不能直接报账，我们都是从票贩子手上买发票，开成办公用品或者其他能报销的名目，票贩子收5个点的手续费。”长沙一位大型国企职员小陈说。

根据小陈提供的电话号码，《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给被人称为“杨老板”的“票贩子”打电话，向对方提出想购买三四万元办公用品发票。

“杨老板”对记者说，“长沙的发票，开办公用品，现在恐怕搞不到。年底各单位报账多，发票都卖完了。广州的也行吗？油票可以？长沙的油票现在还能搞到。你如果不急，下个月再找我咯。”

“杨老板”对记者说，“长沙的发票，开办公用品，现在恐怕搞不到。年底各单位报账多，发票都卖完了。广州的也行吗？油票可以？长沙的油票现在还能搞到。你如果不急，下个月再找我咯。”

2017年，湖南双牌县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刘红安被移送司法机关。自2011年起，刘红安用购买的假发票和虚开的发票套现345万余元。

发票是财务报销的最终依据，一些公职人员却顶风违纪，或巧立名目，或化整为零，或空手套白狼，将发票“变形记”演绎得“炉火纯青”。部分基层干部表示，“假发票”乱象背后隐藏着触目惊心的“真腐败”……

本报记者刘良恒、何伟、沈汝发、朱国亮

“自己有愧党的培养，私欲和贪欲占据自己的内心，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做自己谋取利益的工具，最终在发票中迷失方向，栽了跟斗。”去年，已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湖南双牌县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刘红安在忏悔书中如是写道。执纪部门调查发现，2011年3月以来，刘红安在湖南东安县任职期间，指使司机文明华用虚假发票混同部分真实开支发票到东安县协税护税办、东安县财政局等14家单位、企业报账，报账金额共计458万余元，其中用购买的假发票和虚开的发票报得345万余元。

“刘红安身为领导干部，用虚假发票报账时间跨度之长，套取资金金额之高，作案手段之大胆，几乎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湖南省一位纪委干部认为，刘红安案十分典型，揭开了基层触目惊心的“假发票”乱象的冰山一角。

常务副县长“假发票”套现 345 万元

所谓的“假发票”，基本上都是正规发票，但这些发票有些没有实际交易，纯粹为套取公共资金

在东安县，刘红安绝对算得上一个“人物”。小学教师出身的他，先后在地方国企、乡镇和县直部门工作。35岁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后，刘红安的仕途顺风水，一路看涨——39岁担任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43岁担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在同龄人中绝对算得上是佼佼者。如果不是伙同司机文明华用虚假发票套取巨额公共资金，刘红安的仕途也不会戛然而止。

据知情人士透露，2011年3月，在担任东安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后，刘红安手中权力越来越大，原本行事谨慎的他逐渐放松了对自己

票的方式套取公款，设立“小金库”，并以消费卡、现金等方式发放过节费，共计7.4万元，其本人领取1.2万元；此外，他还利用“小金库”资金组织教职工及家属到度假村旅游等。

在刘红安案中，他用来报账的大量发票都是购买的，报账时大多没有实际发生支出。多位基层纪委人士告诉记者，这种“空手套白狼”的“伎俩”还不少见。

如何斩断“发票黑市”利益链？

“假发票”之所以能够滋生并且屡禁不绝，“需”“供”两个方面的原因都应引起重视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假发票”之所以能够滋生并且屡禁不绝，“需”“供”两个方面的原因都应引起重视。

首先，在严打高压态势下，公款“灰色开支”并没有根除，虚开发票的需求仍然比较旺盛。

其次，目前发票管理制度和财务报销制度存在较大漏洞，给发票买卖和违规报销行为留下了可乘之机。

福建一位税务部门人士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虚开、倒卖发票的成本低、利润高，目前形成了错综复杂的“黑色利益链”。

部分企业由于其特殊性，比如零售环节的超市，客户多是个人，消费后往往不开发票，这类企业就有大量富余发票能挪作虚开之用。

另外，还有很多专门开票牟利的公司，最初注册都是打着投资、咨询、商贸等幌子，然后注册空壳公司、皮包公司，从税务部门骗购发票，对外虚开牟利。

长沙市国税稽查局纪检组长尹波建议，健全税务、公安、纪检等部门的工作联系机制，对重点对象强化执法检查，斩断“发票黑市”的利益链。

公安、税务部门要督促商贸企业强化管理，堵住漏洞，履行责任，严厉打击“内鬼”，对富余发票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督管理。

税务和司法也应加强联动，依法严厉打击虚开发票、不如实填写发票名目等违法行为。

部分基层干部还建议，应该建立严格的财务支出制度，设计财权和事权相互制约的有效方案，探索让经手的单位负责人和财会人员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审计、财政、纪检监察部门要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并形成合力，加大对虚报、滥报费用的执法检查和审计监察。对公共资金的支出、审批、报销、核算实行源头审核控制，对单位和主要负责人违反规定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对典型案例予以曝光。

最后，大力推行公务卡结算制度，扩大公务卡使用领域，覆盖面和效率，建立公务卡使用监管体系，更好地发挥公务卡作用。